

2017年 第4辑


Educational History Studies

教育史研究

周林城题



《教育史研究》编辑部◎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教育史研究

JIAOYUSHI YANJIU

2017年
第4辑

《教育史研究》编辑部 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育史研究. 2017年. 第4辑 / 《教育史研究》编辑部编.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8. 3

ISBN 978-7-107-32366-9

I. ①教… II. ①教… III. ①教育史—研究—世界 IV. ①G5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44943号

教育史研究 二〇一七年第四辑

出版发行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7号院1号楼 邮编: 100081)

网 址 <http://www.pe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宇星印刷厂

版 次 2018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342千字

定 价 30.00元

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采用任何方式擅自复制或使
用本产品任何部分·违者必究
如发现内容质量问题、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电话: 400-810-5788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人民教育出版社
编辑出版

山西师范大学
协办

编委会主任 郭 戈
编委会副主任 张斌贤 邓友超 刘立德
卫建国 薛耀文 储朝晖

主 编 邓友超 刘立德
执行主编 姚宏杰 韩红升

常务副主编 徐卫红 韩华球
副 主 编 万作芳 刘 捷
冯卫斌 于 珍

编辑部主任 徐卫红 韩红升

英文编辑 程 军
封面设计 于 艳

1989年创办

每年四辑

【特稿】

王明达口述 刘巧利整理 关于中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回忆/1

【《苏霍姆林斯基评传》笔谈】

- 顾明远 宝贵的精神食粮/12
朱小蔓 一位“精神巨人”的大型“精神评传”/13
肖 甦 十年磨一剑，挚爱铸承诺/15
诸惠芳 一部苏霍姆林斯基的精神成长史/16
刘立德 海内外苏霍姆林斯基传记研究的集大成之作/17
杨九俊 回到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现场/19
成尚荣 一部灿烂的精神美学之作/21
周 川 苏霍姆林斯基是独一无二的/22
宗锦莲 对话与找寻/23
杨大伟 深入了解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的一扇窗户/24
杨金林 一部填补空白的教育精品力作/25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 钱 逊 读《论语》，学做人/29
楼宇烈 国学漫谈/37
吴安春 中庸的智慧/49

【中国古代教育史】

- 孙国华 明代《进士登科录》体例解读/55

【中国近现代教育史】

- 梁海祥 台湾儒学教育的发展（1945—1987）/83
- 梁民华 傅斯年高校学生管理思想研究/93
- 瀚青
- 罗菊芳 梁漱溟的德育思想与实践探索/103
- 栗洪武
- 刘畅 辛安亭历史教材思想探析/112
- 陈艳君 民国时期弗斯特在华英语教学活动述略/122
- 卞梁 福建女子本土化教学实践历史研究（1938—1951）
——基于华南女校毕业论文的考察/131

【外国教育史与比较教育】

- 夏鹏翔 1945年以来日本社会教育发展历史探析
——以公民馆教育为中心的考察/144
- 刘捷 美国教育见闻与思考/155

【专题研究·高考改革40周年纪念】

- 蒋永清 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回顾/172
- 陈金芳 高考制度改革40年回顾与反思/185
- 张哲人
- 许露 恢复高考初期英语试卷翻译题型的特点探析
——以1977年到1981年为例/195

【教育史著评介】

- 李长印 《历史学习法》评介/211

关于中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回忆^{*}

王明达口述 刘巧利整理

【摘要】1985—1996年，王明达同志任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负责分管全国的职业教育、成人教育。这十余年正是我国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整理者访谈王明达同志的过程中，王明达同志畅谈了对职业教育性质的认识，1985—1996年我国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时代背景和一系列改革举措。这些论述对我国当前大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弥足珍贵。

【关键词】职业教育；口述史；教育综合改革

【作者简介】王明达，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北京 100816）；刘巧利，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北京 100088）

整理者注：王明达同志1985年6月18日至1996年10月11日任国家教育委员会^①副主任，分管全国的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这十余年正是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共和国教育人物口述史”的任务下达后，恰好由我来负责王明达同志的口述史研究部分。经过前期文献、提纲等方面准备，终于开始与王明达同志面对面地访谈。每次两个小时的访谈，王明达同志始终保持着敏捷的思维。每次访谈时，王明达同志总是讲：“由于时间很久了，有些事也记不太清楚，将来如果要采用，请你们要核对正式的出版物。”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重大教育政策的亲历者，王明达同志对其分管的职业教育谈得深入浅出。

^{*}本文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职业教育重要政策亲历者口述研究”（项目编号为GY2014XDY16）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1985年6月18日，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设立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教委成立后，教育部即撤销。1998年3月10日，新一届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经九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国家教育委员会更名为教育部。

一、对职业教育性质的认识

王明达：职业教育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关系比较密切，主要是培养在生产、服务第一线工作的劳动者，包括技术工人、农民，或者在基层工作的实用性人才。一开始在教育体系中没有职业教育。当时在农业社会、手工业社会中，对技术人才的需求量很小，一般采用师傅带徒弟的方式，来传授所积累的技术和知识，这种方式称为学徒制。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生产规模越来越大，使用机器的单位也越来越多。

整理者：您认为是技术的进步、生产规模的扩大以及机器的大量使用对技术工人提出了规模需求？

王明达：对的。生产规模的扩大，使工人的需求量比农业、手工业时期大得多了。在第一线工作的人占人口的大多数，这些人怎么培养？如果还是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就满足不了需要。这样就出现了通过办学校更大规模地来培养技术工人和其他劳动者，并逐步形成了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有显著的区别。不是简单地学文化，还要学技术，通过反复操作、实训，掌握一些特殊的技能，所以在教育方式上、教学内容上，甚至管理方式上，都与普通教育有很大的不同。职业教育非常重视实际动手能力的训练，实行产教结合、校企合作办学，学生要到生产现场进行实际操作训练，毕业后，基本上能够上岗操作。如果一个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到工作场所还不能操作，则认为职业学校没办好。因此，需要对职业教育的理论基础、教学原则、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师的培养和管理等进行专门的研究，就形成了职业教育这个学科。

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要求职业教育不仅数量要增加，办学水平、教育质量要更高，不断向前发展。职业教育有一个特点是变化快。基础教育比较稳定，比如说小学数学，加减乘除四则运算不能总变化，很稳定。而职业教育不同，它与经济、生产联系比较密切，随着生产的发展变化、技术内容的发展变化，职业教育教学内容、教学方式都要改变，这就决定了职业教育的变动性大。办学者要不断地适应经济的变化。

二、改革开放后中央强调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一）当时各个方面都普遍反映职业教育太薄弱了

王明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开始大规模地开展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引进了很多现代化的工程。要把这些工程落到实处，就需要大批的技术工人。所以20世纪50年代各个部门办了一批技工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是培

养在一线直接操作的技术工人，包括车工、钳工等。中等专业学校也是学习苏联的。中等专业学校是培养中等专业人才的，学生毕业后一般做技术员。中专、技工学校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当时又是包分配的，所以初中生毕业能考上这两类学校，是很高兴的，因为有份稳定的工作。

但是后来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职业教育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当时在认识上，有一种观点，把职业教育看作资产阶级“双轨制”的标志物，是修正主义路线的反映，认为普通文化教育为正统的，职业教育是低层次的，把职业教育看作资产阶级路线的产物。因此把大批中专、职业学校撤并或改办为工厂。技工学校、农业中学更是受损严重。1965年，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人数占整个高中阶段学生总数的比例是53.2%，而1970年这一比例下降到了1.8%。职业学校大都变成普通中学了。江苏的农业中学本来发展得很好，在“文革”中都垮了。

“文革”结束以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技能人才的需求就显现出来。当时各个方面普遍反映职业教育太薄弱了。生产第一线的工人都没有经过很好的训练。特别是“文革”中施行的“顶替上岗”的政策使工人素质进一步下滑。

整理者：您说的是“接班制度”吗？我还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我还有同学初中没毕业就去“接班”了。

王明达：对，“接班制度”，即父母在工厂里工作，儿女就可以去接班。不管有没有接受过培训，只要有血缘关系，没有什么技术，也可以进工厂上班。后来很多国企对此反映很强烈。中央也看到了这一点，当时中央最高领导提出来要加快发展职业教育。1978年4月，邓小平同志在全国工作会议上指出“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他特别强调：“国家计委、教育部和各部门，要共同努力，使教育事业的计划成为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该考虑各级各类学校发展的比例，特别是扩大农业中学、各种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比例。”^①

1980年5月，教育部拟出了一个关于发展职业教育的规划，报到中央。中央书记处在1980年5月8日和12日，两次讨论了教育部上报的这个规划。中央书记处提出中等教育结构是个很大的问题，非改不可。这个问题不能由教育部来单独解决，经济部门、计划部门、劳动部门、教育部门要结合起来，发展职业教育。

（二）考察经济工作的代表团提出了职业教育的问题

王明达：各个部门的领导也开始重视职业教育。举一个例子。1987年9月11—17日，时任国家经委主任吕东同志带领代表团到瑞士考察经济工作。1987年9月30日吕东同志给国务院写了一个考察报告，报告认为：“瑞士的培训制度很值得我们学

^① 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606页。

习。我国过去是农业国，又长期受旧体制的影响，不仅传统的职工培训基础薄弱，更缺乏现代的培训经验。这几年这项工作虽有了很大的进展，但还没有建立一套系统严格的制度，没有形成强大的社会风气。在一些地方，重‘大专文凭’，轻‘专业技能’的情况仍十分突出。目前很多产品质量上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同我们职工的素质差、管理水平低有关。这个问题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从根本上来讲，下决心连续培训几代青年工人，是中国提高产品质量、打入和占领国际市场的百年大计！”^①他向中央建议，要下决心连续培养几代合格的青年技术工人。代表团是去考察瑞士经济工作的，但报告重点写了瑞士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本来中央已经看到了发展职业教育的必要性，又经过各部门的反应，就更加下定决心要发展职业教育。

（三）农民的职业技术素质更需要提高

王明达：在农业方面问题更加突出，技术更薄弱。种地的农民，在有些地方文盲多，技术上不太懂。有的山区农民，本来可以种果树，可以做养殖，真做好了，可以致富。但致富的人并不多，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技术跟不上，农民缺乏一些基本的农业技术。

我分管职业教育后，到太行山区去考察。太行山区是老革命根据地，山区农民比较贫困。河北农业大学在国家科委组织下，开发太行山，选了几个县做实验。河北农大派了一些教授下去，采取了三个措施：一是小流域水土流失治理，二是小家禽饲养防疫，三是果树科学管理。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我到河北农大考察，农大的教授介绍说，他们推广果树科学管理的时候，遭到了激烈的反对。我很不理解，这是好事，为什么还有人反对呢？

原来是当时当地农民文化知识水平、科技水平较低，他们认为果实是结在树枝上的，把树枝剪了，修枝以后，果实无枝可长。当时反对到什么程度呢？河北农大教授为了能够推行下去，向农民保证说，往年能结多少果，如果果树修枝后减产了，减多少斤，我们就赔多少斤。这样还有农民不相信。就得由县委书记下去作为政治任务来动员，甚至有的县委书记带着剪刀到现场示范修枝。当时推广简单技术就是这么困难。

如果农民是这样的素质，中国农业怎么能实现现代化呢？我回来后向何东昌同志做了汇报，何东昌同志让我在国家教委内部工作人员的会议上介绍了情况。农村缺乏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很多人上了小学、上了初中，但是缺乏农业技术知识，没有树立起相信科学、依靠科学的精神，从而影响了农民吸收科学技术的能力。在太行山发生过很多啼笑皆非的事。有的农民不相信树要剪枝，教授要剪枝，农民就抱着树

^① 杨金土编：《30年重大变革——中国1979—2008年职业教育要事概录》，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3页。

不让剪。如果你要强制性地剪，他就抱着树哭。

我们到了河北省阳原县的一个村。村中有一个55亩的苹果园，果树有17年的树龄，产量很低。后来我们就找张家口农专的校长、老师，去研究一下为什么果树不结果。四月份一开春，一位老师下去，到了果园里，做了简单的调查就发现了问题，果树上的虫太多了，农民不知道去灭虫，不知道怎么灭虫。果树上长嫩芽的时候，嫩芽就被虫子吃掉了，当然就不结果了。这个老师采取了最简单的办法，用普通的杀虫剂进行喷洒。当年果园的产量就有2万多斤。后来又采取其他的管理措施，过了几年，同样的苹果园结了12万斤苹果。从这些例子，我们就深深地感觉到，教育有责任把科学技术送到农村去。教育要培养农民的科学精神，使他们相信科学、依靠科学，让他们遇到了问题要想到通过科学的途径解决。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我想很多地方致富的速度会加快的。

我们也有责任去普及简单的农业技术教育。德国在农村发展的早期，为了使农民掌握基本的农业技术，举办初等职业教育培训，经费缺乏，就利用农村中小学的场所举办“星期日学校”。我国培训农民的职业教育在30年前很薄弱，社会强烈呼吁要加强农村职业教育。教给农民简单的农业技术并不难。只要在中小学认真开展劳动技术课，就可学到一点简单的农业科学技术。原先我以为只是在太行山区有这种情况，后来到更多的地方看了后，发现这种现象比较普遍。当然这种情况是在30年以前。

针对当时农村的情况，何东昌同志提出普通中学应该从办学为了升学转到以为当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主，兼顾向高一级学校输送新生这样一个方向上来，农村教育要进行综合改革。在办好基础教育的同时，还要办好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实行“三教统筹”，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后来何东昌同志又进一步提出实施“燎原计划”，在农村中小学，根据当地情况开好劳动课，适当引进实用技术。实施“三教统筹”，引进新的农业项目和种植技术，对脱贫有明显作用，各地都有一些好的典型。^①现在我们很多地方脱贫致富，也多是引进新的技术、新的品种。我认为真正脱贫，得用教育的办法，提高人的素质，提高农民自我发展的能力。如果一个农民没有自我发展的能力，只是靠别人帮助，就很难稳定脱贫。也许有人帮助的时候，教农民怎么种、怎么管理，但是别人不能总在这里帮助他呀，人一走，可能又不行了。因此，如何增强自我发展能力，这是一个关键问题。我认为教育也应该承担一些责任，当然不能光靠教育，科技推广也很重要。但结合起来，力量会更强大一些。所以我们提出了“农科教结合”，主要是从这些调查、这些典型例子中提

^① 贵州的关岭县乌拉村种生姜，有一个老师种生姜很有一套办法，他就利用劳动技术课教给学生。四五年级的学生就可以掌握这种技术，因为这种技术很简单。结果他们村的收入就比周围的村庄高出一倍。

出来的教育改革举措。后来，国家提出了“科教兴农战略”，要落实这一战略，必然要求“农科教结合”。教育有责任为农村培养各类专业技术人才，提高农民思想道德和文化科技素质。

从这些例子看到城乡都迫切需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但由于各种社会原因，有些人还是不重视这个问题。这就是中央为什么提出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最重要的原因，归纳起来就是：从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考虑，城乡都需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20世纪80年代，每年的“两会”上都有不少的代表、委员呼吁政府重视职业教育。全国政协还专门进行过为什么职业教育不受重视的专题调查，调查后提出了建议对策。

三、职业教育不受重视的原因

整理者：您说当时开“两会”的时候，就有来自各个领域的代表提出来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王明达：各个方面的代表，包括熟悉农村情况的代表，都希望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但现实情况是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不高，鄙薄职业教育的现象广泛存在。对这个问题我们曾做过调查、分析。

为什么人们轻视职业教育呢？

第一，一线劳动比较艰苦。我们曾经到北京和日本合作的一个企业调查。这个企业条件很好，但20多年前，在北京招不到工人。只能招外地工人。北京的孩子觉得工厂劳动太艰苦，特别是觉得当工人还要上夜班，就不愿意去。这就需要从观念上有根本的改变，要树立做任何工作都需要付出艰苦劳动的观念，要有这种思想准备，要教育青少年热爱劳动。

第二，长期以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影响广泛，许多人不愿意学习职业教育，不愿意从事第一线工作。

第三，对一线工人的劳动不够尊重，对他们的宣传也不够。对此，过去不少人提出了很多意见。现在已经开始改变，宣传劳动模范，宣传工人杰出代表对国家的贡献，宣传大国工匠，弘扬工匠精神，逐渐形成了尊重第一线劳动者的风气。

第四，当时改革中等教育结构，各地几乎普遍地把当地办学条件差的中学变成了职业学校。这给社会的消息是：职业学校就是最差的学校，办学水平差。这样怎么能吸引孩子上职业学校呢？

第五，在第一线工作的劳动者中也有很多优秀人才，但进入职业教育这个门后，继续深造的上升通道不够畅通，缺乏完善的制度。

四、采取七大举措，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王明达：社会对职业教育有客观的需求，人们又普遍轻视职业教育，面对这种情况，中央强调大力发展职业教育。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战略，明确指出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但需要高级科学技术专家，而且迫切需要千百万名受过良好职业技术教育的中初级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技工和其他受过良好职业培训的城乡劳动者；提出要逐步建立起一个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

关键是怎么落实的问题。我们是怎么落实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要求的呢？

第一，提高认识。尽管这个话是老生常谈，但确实很重要。同样的条件下，领导认识到位了，当地职业教育发展就比较好；领导不重视，认识不到位，职业教育状况就比较差。所以，提高认识是关键。这个认识，首先是领导的认识。举个例子。当时河北省委书记邢崇智同志很重视发展职业教育，亲自推动，并要求每个县建一所标准比较高的职业教育中心。老百姓看到政府花这么大的力量来建设职业学校，甚至比普通高中还好，学生就愿意报这样的学校，教师也愿意到职业学校教书。这样的例子在其他省份也有。山东省很重视，山东的职业教育发展就比较快；上海市、北京市也很重视发展职业教育。这些省份职业教育就都走在全国的前面。所以说，首先就要提高认识，领导要重视发展职业教育。

第二，政府要强力地推动。20世纪80年代中期职业教育各方面的情况还比较差。当时以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为重点。为了推动职业高中的发展，国家提出了明确的发展目标，要求中等职业教育的招生数与普通高中的招生数大体相当，也就是通常所简单地表达的1:1。当时提出大体相当的发展目标，也是为了推动、落实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要求，是以量化的指标来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

第三，改革办学体制和机制。过去，中专、技校是政府办的。1986年召开了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李鹏副总理讲话，号召职业教育大家来办，不光是政府办，社会各方面也都可以办；办学形式也多样，不光办三年制的，也办些短期班，长短结合；要根据社会需要来设置专业，给学校办学自主权，鼓励大家改革、探索。在这期间各地都出现了一批办得好的职业学校，如北京的劲松职高、北京外事学校、北京商贸学校、北京交通学校、昌平职业学校等，它们抓改革比较好，大胆地进行了探索。

第四，加大对外开放的程度。我们从国际比较中找到差距，促使各地向发达国家学习好的经验。国际合作形式多样，与国际组织、政府、民间团体、学校之间都开展了职教合作。各种形式的考察、访问、学习遍及主要发达国家。在国际组织合作方

面,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合作最有代表性。从1988年开始,世界银行安排了两期8000万美元的贷款,支持了150所学校的实训基地建设,这些学校后来都成为全国职业教育示范骨干学校。国家间的职教交流主要集中在与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美国、日本等国的交流合作上,其中与德国、澳大利亚政府间的合作规模较大。与德国的职教合作是由两国总理推动的。其中一件重要的事情是在1988年春,国务委员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同志在钓鱼台与德方代表伯克博士就中德职教的合作问题交谈了一整天,最后形成两项决定。一是由德方资助,中德合作建立职教研究所。后因此项目涉及与世行职教项目贷款的关系问题,德方又在上海和沈阳两地资助建立了职教研究所。二是在1988年下半年,我国派沈阳、苏州、无锡、常州、沙市、芜湖6个城市的主管副市长、教育局长、劳动局长和企业学校的代表近30人到德国考察培训一个月,然后在这些城市选点推行德国“双元制”职教经验。这是我国学习德国职教经验的一次较大活动。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由政府派出考察学习各级职业教育团体很多,主要是到德国、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进行考察。代表团既考察它们的办学体制,又考虑教学计划和教材的引进等问题。山东省平度市有一个和德国合作的职业学校。为了引进德国养奶牛的技术,学校派人到德国学习养奶牛的技术,回来就办培训,培养养奶牛的人才。职业学校带头养奶牛,做示范,带动平度养奶牛,促进了当地的产业结构调整。

第五,多渠道筹集职业教育经费。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初期,国家财力有限,经费主要靠地方、行业、学校自行筹措。于是我们倡导多渠道筹集职教经费,如收学费、捐资、校企联合办学。企业提供些实习设备,有时也提供些经费补偿,也就是录用一个学生,给学校相应的费用。学校自己搞生产,收入用于办学。通过多种途径来解决职教办学经费。这就要求职业学校校长克服很多困难。职业学校的校长很辛苦,到很多地方要钱去,要跑很多路,就要有“飞毛腿”;要说很多话,就要长着“铁嘴”;要准好碰钉子,就要长着“铜头”。“飞毛腿”“铁嘴”“铜头”,这就是当时职业学校校长的形象。现在好多了,政府财政对职业教育的支持很大。

第六,抓典型,推广先进的经验。有些典型有普遍的示范意义。北京市一直在推广北京劲松职高、北京商贸学校、北京交通学校、北京外事职高的经验。每个地方都有一批典型,这些典型体现了职业教育本身的特点,体现了职业教育的办学规律,是其他学校学习的榜样。

第七,把发展职业教育纳入法制轨道,加强职业教育立法。领导认识很重要,但是不能光靠领导认识。立法规定了,就是强制性的,不管谁做领导,都应该按照法律来办事。《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从1989年开始准备,其间经历了许多争论,

经过7年，修改了13稿。经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后，1996年5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明确了职业教育的地位、职业教育的体系构成、政府和有关方面在发展职业教育中的责任。其中特别用了比较长的篇幅，来规定职业教育的经费怎么解决。除政府要出钱发展职业教育外，也要动员社会力量办职业教育，企业应当承担准备录用的人员进行职业教育的费用，地方开征的教育费附加可以专项或安排一定比例用于职业教育。

五、高中阶段普职1:1的决策过程

整理者：普职比为什么是1:1而不是别的比例？

王明达：当时征求了多方面的意见，根据劳动力水平、高校的招生规模等因素进行了综合分析、测算，并广泛地向国际专家征求了意见。当时德国职业教育专家提的建议是职业学校学生应该到70%，我们认为这个比例太高了些，就提出了50%。

整理者：这是征求了多方面的意见，包括国际教育专家的意见。这样的决策过程，资料上是很难查到的。

王明达：我们当时认为是可以做到的，提法是全国平均达到50%，发达地区还应该高一些。这是有根据的。1984年9月，上海中职达到52.7%，所以我们认为全国经过努力也是可以达到的。从1985年开始明确提出了50%，高中阶段普职比是1:1，各占50%。

当时高校招生数很少，大量的毕业生不能进高校，又没有技术，所以成了一个社会问题。根据当时现实情况，压缩普通高中，发展职业高中。当时百废俱兴，社会需求也很大，职业高中的就业形势也很好。例如，改革开放后北京办了很多饭店，当时学生都愿意到星级饭店去工作，做厨师、做服务员。现在情况也在变化，特别是现在高职发展以后，高职实际上取代了中职的很多事情，中职招生就降下来了。这也是符合规律的。

六、参与市场竞争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力

整理者：您谈得很丰富。您所说的认识问题，特别是领导同志的认识问题，到现在仍然是个大问题，有的地方职业学校的教师就说，领导根本不重视职业教育。有些地方还是这个状况。

王明达：这和经济发展有关系，如果真的参与市场竞争，需要生产高质量的产品，提供高水平的服务，就会重视职业教育。当然职业教育办学形式要灵活一些。

近来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大国工匠”这个栏目，介绍了好几位工人师傅，有特

殊技能和工匠精神。像航天部门高技能人才就很多。因为这些部门要求高，有这样的需求。如果不培养这样的人，产品就上不去。有些地方，没有真正参与到市场竞争里面去，质量差一些，也可以对付。像瑞士这样人口少的国家，在激烈的竞争中要占有足够的市场份额，就必然会重视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

整理者：您认为随着我国参与国际化市场，随着我国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发展，职业教育会有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发展吗？

王明达：这是肯定的，也是必由之路。我国正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制造业要迈上中高端水平，国家将更加重视职业教育，培养大批高素质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如果没有大批高素质劳动者，我们的产品要上一个档次，产业结构要调整，那是很困难的。2014年中央再次召开了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对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做出了重要指示，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我国职业教育进入了加快发展的新时期。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大大增加，职业教育办学水平、教育质量有很大提高，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正在形成。随着职业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我国职教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培养大批高素质的技术人才做出重要贡献。

七、1985—1996年职业教育改革的重大事项

王明达：简要地回顾一下，我主管职业教育十年间的重要改革，大概有11项。

一是调整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中学，改革普通高中。

二是改革办学体制，由单一的国家办职业学校、企业办职业学校，发展为大力发展民办职业学校、社会力量参与办职业学校。

三是由单一的长学制改变为长短结合、形式灵活多样。职业教育有句话是“无长不稳，无短不活”。办学模式的变化，使职业教育和终身教育更好地结合起来。我们借鉴德国“双元制”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教育经验，在各地试点，实行校企合作、行业参与办学、工学结合、加强实训，使学生毕业后就能上岗。在农村，实行三教统筹、农科教结合，形成了农村职业教育培训和技术推广网络。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村职业学校逐步转到主要培养进城务工的农民。城市职业学校也进行了布局调整，办了一批重点示范学校。

四是实施农村教育综合改革。调整农村职业学校布局，一个县首先集中力量办一所综合职教中心，提倡职业学校应该是几个牌子一个实体。职教中心应该成为“二传手”，施行“上挂横联下辐射”发展模式：上挂是和农业大学、农业研究所取得联系，从它们这里得到新的技术；横联就是要和农技推广部门、成人学校联合，进行实用技术的培训；下辐射就是辐射到村里面，形成农村实用技术的推广网络。